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竺可桢

余 音 编

卷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竺可桢

卷

余音 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竺可桢卷 / 余音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36-8114-2

I. ①现… II. ①余… III. ①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第 210978 号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竺可桢卷

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ZHU KEZHEN JUAN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统筹:王 骏 钱 江

责任编辑:马小玲

装帧设计:阮 娟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1,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戊戌变法失败了。一边是慈禧再度“训政”,一边是废黜光绪,废除新政,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其中独有一项“成果”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那人是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那“成果”便是京师大学堂。

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

至1949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架构已基本形成。

由此,人们常常发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袁氏复辟,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外敌入侵,十四年抗战,虽取得胜利,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如此时空背景,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诞生了一批名校,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

级的教育家、科学家、思想家。为什么？

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

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总会想到西南联大，更会这样发问。

二

2010年3月14日下午，首都机场。全国两会结束，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是热门人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

“你是哪家报社的？”朱校长问李传玺。

《江淮时报》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向朱校长介绍了李。

“噢，你研究胡适啊，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

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

2012年初，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

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同意。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初春的一个下午，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虽然天气不热，却紧张得一手心汗。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欣然同意。

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

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很平和，却更入灵魂。

蔡元培先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张伯苓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蒋梦麟先生：“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畀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阻挠也”。

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胡适先生：“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

竺可桢先生：“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

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

不需要再引了,读着这些话,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即使不是,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

李传玺

2015年3月

目 录 |

导读

- 1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第一辑 教育思想(1928—1935 年)

- 15 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
19 地理教学法
23 利害与是非

第二辑 教育思想(1936—1945 年)

- 29 初临浙江大学时对学生的训话要点
30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40 旅行是最好的教育
45 浙大办学方针要点
46 宣誓典礼上的誓词、答词
49 升旗仪式之意义
52 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
55 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59 论女子教育
64 服务和享受
68 大学生之责任
70 题赠张哲民
71 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76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83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弁言
85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竺可桢卷

90	遭轰炸而反更能深省奋励
91	切实体行《国民公约》
94	卫生与纪律
95	努力参加抗建大业
96	在“六三”百周年纪念演讲比赛会上的致词
98	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
102	“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演讲词
105	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
106	在浙大实验学校补行始业式上的训辞
108	当以服务为主旨
109	奋励自勉 自强不息
110	浙江大学之使命
111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发刊辞
112	体念时艰 安心求学
114	新年致辞
115	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
116	要重视礼节
117	歌咏与戏剧
118	大学生与抗战建国
121	报国立身之良机
122	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
123	不应有所负于国家
125	大学之使命
126	战后之中国
128	抗战及战后的大学
130	反攻时期之大学教育
134	毕业生对国家应尽之义务
136	大学毕业生之责任

第三辑 教育思想(1945—1956 年)

- 143 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
144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
150 中学教育之使命
152 大学教育与民主
156 对 1948 年应届新生的训话
159 避寿启事
160 浙大成立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词
162 “五四”以来我国大学教育内在的矛盾
166 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
171 实践是最好的大学

第四辑 科学之精神

- 179 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
183 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
184 科学研究的精神
188 常识之重要
190 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196 论不科学之害
201 《科学的民族复兴》序
203 《科学的民族复兴》结论
207 科学与革命
211 科学之方法与精神
219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228 科学与世界和平
234 科学工作者之立场
235 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

- 245 纪念尼古劳斯·哥白尼
——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讲
- 249 谈阳历与阴历的合理化
- 254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第五辑 人生之洞察

- 285 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
- 297 天气和人生
- 301 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
- 310 论欧战给于吾人之教训
- 313 宇宙与人生
- 320 致苏步青等函

第六辑 赤子之情怀

- 325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致郭沫若
- 327 附郭沫若复函
- 328 钓鱼岛地区开发应归我所有
——致周恩来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余 音

在中国教育史,乃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竺可桢算不上一位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他的权势和知名度,比不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甚至也不如司徒雷登、梅贻琦、张伯苓,但人微未必言轻,当我们再次翻开民国大学史册,拂去厚厚的尘埃,却惊诧地发现,他的教育思想余温犹在,不失为医治当今中国大学各种顽疾的一剂“猛药”。

十年磨一“剑”

千百年来,中国老师大都是用“对对子”的方法,训练弟子们的表达、思维、反应能力。到了近代,科举关门,八股歇菜,造句取代了“对对子”,后来而居上。

这一天,浙西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市)天华寺里,毓菁学堂正在上课。国文老师章镜尘走进教室,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作业:用“苦、甜”造句。

苦与甜,是孩子们最熟悉的生命体验。

很快，作业收上来了。

章镜尘一边看卷子，一边摇头。“黄连最苦，蜂蜜最甜。”话说的不错，却没啥意思；“母亲的微笑最甜，没娘的孩子心里最苦。”有点意思，却没啥新意……

看完卷子，章镜尘下了讲台，手拿一张纸，来到第一排，对一个身材矮小、脸色蜡黄的男生说：“竺可桢，这是你的作业吗？”

竺可桢站起身来，双手接过卷子，用眼睛瞟了一下老师，神情有些不安但语气坚定地答道：“是我的。”

“你给大家念一念，声音大点。”

全体同学的目光一齐聚焦到竺可桢的身上。

教室里寂静无声。窗外，几只秋蝉叫得格外响亮。

竺可桢咽了一口吐沫，然后，仰起脖子，放声念道：“丧权辱国最苦，国家富强最甜！”

教室里寂静无声。窗外的秋蝉，也停止了鸣叫……

“说得好！”章镜尘用手轻轻地擦掉竺可桢额头上的汗珠，示意他坐下，转过脸对弟子们说：“读书不忘爱国，爱国更需读书。竺可桢今天造的句子最好，你们要向他学习，从小立志，长大报国！”

这一年，是1900年，竺可桢10岁，刚上小学二年级。

毓菁学堂创办于1899年秋天，也是戊戌变法倡导的“废私塾、兴学堂”的首批成果之一。当时，在绍兴地区，毓菁学堂是开办较早的新式小学之一。“毓菁”的寓意，就是希望为社会培育出更多的精英人才。当时，毓菁学堂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共读六年，招收学生100余名。竺可桢是首届毕业生。高小毕业时，只有不到10人拿到毕业证，竺可桢的学习成绩名列第一。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贫寒之家，又名绍荣，字藕舫。父亲竺嘉祥，先务农，后经商，在东关镇开了家“承茂米行”养家糊口。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排行老么。虽然父母疼爱有加，无奈身体羸弱，三天两头生病，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同学们跑步、打球、做游戏、玩器械，他总是呆在一旁，不愿参与。1908年，竺可桢考入上海复

旦公学，与胡适同学。胡适生性活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次，同学们闲谈，胡适对竺可桢说：“藕舫，你再不好好锻炼身体，我敢打赌，你寿不过20岁。你再怎么胸怀报国之志，又有何用？”竺可桢深受刺激，从此下定决心锻炼身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风雨无阻，气色一天好过一天。

19岁时，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远离故土，开始了漫长的求学生涯；两年后，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开考，全国400多人应考，70个名额，竺可桢以第28名的成绩被录取。同批留学生中，还有胡适、赵元任等。到了美国，竺可桢先到伊利诺大学学习农业，后来，兴趣发生变化，又转往哈佛大学地质系，攻读气象。1915年，竺可桢获得硕士学位；1917年，成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18年，一拿到博士学位，他便返回祖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正当他埋头教学、科研，不愿为琐事分心的时候，蒋介石亲自点将，让竺可桢返回家乡，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让蒋委员长没有想到的是，竺可桢书生意气太浓，谈完话，竟回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5月的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的名字，源自明末清初著名的浙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君子之学，惟求其是”。次年9月，也就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求是书院选送了何燏时等四人留学日本，“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下令进行学制改革，浙江大学在求是书院的原址上宣告成立，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师生统共500多人。浙大成为浙江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但是，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相比，无论是规模、实力，还是名气，浙大都是排名靠后的“小弟弟”。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两天后，杭州各校学生冒雪走上街头，予以声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非但不支持学生的爱国之举，而且在校内大搞镇压活动，并同意军警抓

走12名学生。浙大师生忍无可忍，掀起了“驱郭运动”。蒋介石亲赴浙大训话，为郭任远撑腰，无奈郭某众叛亲离，师生坚决不答应。一个多月后，蒋介石见郭任远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为稳定局势，不得不同意撤换校长。

竺可桢认为校长一职百事缠身，工作量“十倍于研究所所长”，而且自己“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他拜访了绍兴乡贤、教育大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元培却支持他接下浙大这个烂摊子，“欲栽大木柱长天”。不久，竺可桢答应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财源须源源接济；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1935年4月25日，竺可桢走马上任。作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观云知天，能掐会算。可是，他没有料到，上轿容易下轿难，在浙大校长的位置上，他一千就是十三载；他更没有料到，到任不久，浙江大学四次迁校：一迁浙江天目山、建德；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十三年中，竟有九个春秋处于颠簸流离的办学状态。

彩虹出在风雨后，奇迹生于磨难中。经过战火的洗礼，到了1948年，浙大已发展成文、理、工、农、师、法、医7所学院，25个学系，10个研究所（室），223名教授，624名教职员，2171名在校生，学校规模翻了几番，而且，教学、科研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1940年一学期为例，数学系在中国权威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寄往国外20多篇；生物系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6篇。“过去中央研究院《科学纪录》中所发表的文字，浙大教授独多；近来研究院第一次选举院士，浙大教授有四人膺选，仅次于北大、清华；浙大的毕业生在各界服务素来以负责著称，本届中央建设人员高等考试，与考者一千零八十四人，取了八十八人，浙大占十一人；考取公费及奖学金赴欧美者亦日多；英国牛津大学近来并承认了我国七个大学，其毕业生中之优秀者可以直接升入牛津的研究院，浙大即为七个大学中之一。”（竺可桢：《大学教育与民主》）1944年10月，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李约

瑟博士系统考察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认为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称其为“东方剑桥”。

“谋食”更“谋道”

浙江大学一举成名，与竺可桢的辛勤耕耘不无关系，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

概括地讲，竺可桢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领袖”教育思想：大学不是任何个人、财团、党派开设的私塾，而是社会公器，是国家民族培养领袖人才的摇篮。1935年9月，未做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就在《常识之重要》中提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知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到任之初，他就开宗明义：“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大学是养成一国领袖人才的地方。”竺可桢倡导的“领袖”教育理论，与散发腐朽气味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也是纠正高等教育普及化、低俗化倾向的锐利武器。为什么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未来领袖人才？竺可桢对此做了深入思考。1937年10月，他在天目山校区，对一年级新生发表演讲，具体分析道：“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1939年2月，他还豪情万丈，对弟子们提出了四大努力方向：“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

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1948年4月,在浙大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上,竺可桢再次重申:“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的地方。”可见,“领袖”教育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

二是智慧教育思想:大学是专科教育,还是通科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所谓的专科教育,就是学生在学校学的,到社会马上就可以用得着,学工的当工程师,学法的做律师、法官,学医的一上班就能坐堂开药方……所谓的通科教育,就是一科为主,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等学科都涉猎一点。专科教育的优点是学以致用,便于就业;缺点是眼界太窄,后劲不足。通科教育的优点是广闻博览,见多识广;缺点是样样通、样样松,不能马上上岗。专科、通科,各有利弊,犹如鱼和熊掌,令人难以取舍。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画地为牢的思维模式。像任何事物一样,知识本身也是分层次的,低级形态叫学问,中级形态叫智慧,而高级形态则叫思想。学问只是知与不知、知早知晚的问题;能够将学问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变成能力的,就是智慧;而智慧的创新化、理论化、体系化,则可以称之为思想。大学之前的教育,基本上是解决学问问题,而大学教育,则是要重点解决智慧问题,也就是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科教育和通科教育,都是“船”和“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过河”。竺可桢坚决反对授人以鱼,而提倡授人以渔。所以,他在不同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即以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是专重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哪个方向,既不能预料于事先,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是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有很重要一点根本不合。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